

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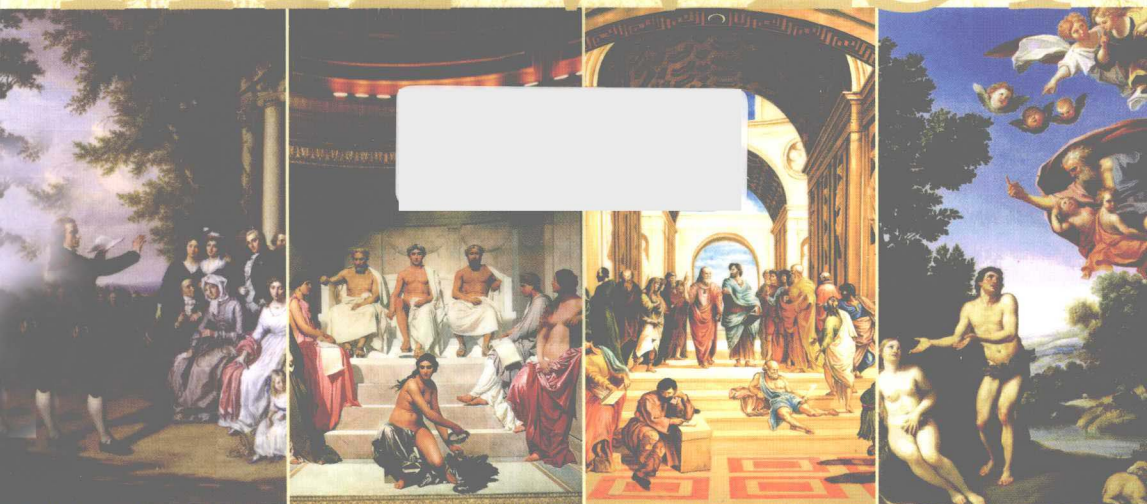
Four Cultures of The West

西方的四种文化

〔美〕约翰·W.奥马利 (John W. O' Malley) 著

宫睿 译

FOUR
CULTURES OF
THE WES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our Cultures of The West

西方的四种文化

〔美〕约翰·W.奥马利（John W. O' Malley）著

宫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6-23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的四种文化/(美)奥马利(O'Malley, J. W.)著;宫睿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ISBN 978-7-301-20876-2

I. ①西… II. ①奥… ②宫… III. ①西方文化-文化史
IV. ①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666 号

FOUR CULTURES OF THE WEST by John W. O'Malley

Copyright © 2004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西方的四种文化

著作责任者: [美]约翰·W. 奥马利 著 宫 睿 译

丛 书 策 划: 周雁翎

责 任 编 辑: 周志刚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0876-2/G · 345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211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论 雅典和耶路撒冷	(1)
四种文化	(9)
合作与竞争	(29)
文化?	(34)
一份邀请函	(41)
 第一种文化 先知与变革	(45)
先知们	(48)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63)
路德和宗教改革	(70)
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	(80)
 第二种文化 学术与专业	(93)
基督徒和哲学家	(96)
学术文化的诞生	(106)
天特大公会议	(123)
机构的恢复及其风格	(137)

第三种文化 诗歌、修辞与公共利益	(149)
雅典和罗马	(152)
基督徒的著述者与领袖	(158)
文艺复兴	(175)
文艺复兴之外	(191)
 第四种文化 艺术与表演	(209)
上帝住所的建造与装缮	(213)
从破坏偶像的争论到文艺复兴	(228)
大危机	(243)
巴洛克的庆典	(259)
艺术和表演的繁盛	(268)
 结语 我们的经验之书	(273)
 阅读书目	(279)
致谢	(285)
西汉专名对照表	(287)
译后记	(299)



雅典和耶路撒冷

四种文化深深植根于西方历史中的现象，实际上，它们植根于西方历史是如此之深，以至我们有时候对于它们的意义浑然不觉。这四种文化起源于古代“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地中海世界。它们包括：（1）以赛亚和耶利米的先知文化；（2）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文化；（3）荷马、伊索克拉底以及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诗人、戏剧家、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文化；（4）菲迪亚斯、波利克里塔斯、普拉克西特列斯以及其他无数艺术家、工匠与建筑家的艺术和表演的文化。这些文化跨越时空从早期基督教的罗马世界传播到中世纪。在 11 世纪和 16 世纪之间，通过一系列的探索发现，即我们所称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它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秩序和动力，由此推动它们进入了现代世界。

本书将探讨西方历史上的四类现象。我称其为文化。

在阐明它们的特质时,我将充分发挥我的专长——基督教史。本书是为那些对两种历史(雅典和耶路撒冷)中的某一种感兴趣的人而作,虽然这两种历史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是无法分别的。因此,我写这本书不仅面向专家,而且也面向学生和一般读者。专家们会熟悉我所讨论的人物、话题以及运动,不过我希望我的思路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思考那些问题的新颖角度。学生以及一般读者可能在一开始会被他们初次见到的或至少是从未细究过的一大堆名词搞得头晕目眩,但是我相信他们将从本书中获益。暂且撇开其他不论,它呈现了一个解释性范畴的框架。本书主旨并不隐晦,且反复地被阐述。其中的话题和人物都多次出现,每次所呈现的角度都略有不同。如果你第一次没有把握住,第二次、第三次你总能领会它们。我认为,对于那些从事教育的人士而言,本书尤其值得一读。

我将在四种文化的构架中进行我的研究。书名已经点出,这本书首先是关于那些文化的。我将它们定性为深深植根于西方历史中的现象,实际上,它们植根于西方历史是如此之深,以至我们有时候对于它们的意义浑然不觉。这些现象相伴我们至今,虽然形式上已面目全非。本书的目的是让我

们不再对它们熟视无睹，而要投以更多的鉴识。

“四种文化”，这个念头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在许多年前，当时我身在罗马，正在写一本文艺复兴时期西斯廷教堂(the Sistine Chapel)中布道的著作。接下来，它们还帮助我以一种颇为新颖的方式清理了我研究的另一个领域——17世纪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中令我纠结的问题。在我论西斯廷布道的书中，我必须直面人文主义的“新学识”(the new learning)与其中世纪的先辈(有时候是敌人)——经院哲学的关系。我的那本书所论述的无外乎就是那种关系，我追踪了人文主义的修辞方式的出现对情绪、意图、宗教情感、文化感受力乃至布道内容的转型效果，它将那些中世纪的风格逐步塑造为颇为不同的风格。我发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事情怎么说与所说的那些事情是什么同样重要，尽管“怎么说”和“是什么”绝不能截然分开。

当我开始研究宗教改革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我看来，在伊拉斯谟和路德关于自由意志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怎么说”的差别较之于他们关于自由意志和恩宠“是什么”的差别似乎更为深刻，其影响也更为深远。他们是以不同的风格来言说的。他们怎么说和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一样存在差异。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是不是指向着更为深刻的差异呢？在以同样的文本进行论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来自不可调和的立场呢？我似乎越来越觉得这来自不同的文化。

我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因为我受到的是非常老式的耶稣会士的训练，它们会自觉地不断重现，那是人文主义传统与经院哲学传统的混合，两者在我所受教育的课程上都

有体现。我迫切地想更好地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知道有一种便捷的解释：经院哲学提供了内容，人文主义赋予其文采，但是我也知道这里的東西不止于此。后者没有形式或者风格吗？前者没有内容吗？然而，我日益觉得风格的问题是關鍵所在。

以上这些是本书写作的源泉。尽管有来自朋友和同事的鼓励，动笔却颇为迟疑。我欣慰于我所受的教养，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局限，并且像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我对宏大构架怀有疑虑。我最终决定动笔是因为我相信，读者能很好地理解我所要表达的东西——不是站在高处向人宣讲，而是启发讨论和反思。这是文章(essay)这个词的本初含义——一次尝试，一次突破。

就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我认为这些文化起源于古代“雅典与耶路撒冷”所在的地中海世界。它们包括：(1) 以赛亚和耶利米(Jeremiah)的先知文化；(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文化；(3) 荷马、伊索克拉底以及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诗人、戏剧家、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文化；(4) 菲迪亚斯(Phidias)、波利克里塔斯(Polycletus)、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以及其他无数艺术家、工匠与建筑家的艺术和表演(performance)的文化。

这些文化跨越时空，从早期基督教的罗马世界传播到中世纪。在11世纪和16世纪之间，通过一系列的探索发现，即我们所称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它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秩序

* 以上三人均为古希腊时期的著名雕塑家。——译者注

和动力，由此被推动着进入了现代世界。

我将详细地描述这些独特的运动，并试图使读者领会它们的意义。然后，我将特别关注 16 世纪，那时，这些文化在宗教争论的外衣下彼此相遇和斗争，它们各自的特征由此也更为彰显。那是一个杰出的鼓动家的世纪——路德、伊拉斯谟、米开朗基罗还有天特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的神学家。这个世纪是我最为了解的，本书的核心就是这个世纪。然后我将快速地来到现代，对那些文化在北美的际遇做一些考察，当然那些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被世俗化了，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对现代做更多的考察。如果读者觉得非常有必要那么做的话，我请他们去发掘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那些文化的传入和影响。

在 2 世纪末 3 世纪初，那位激进的基督教护教士和辩护者德尔图良（Tertullian）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为我思考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基本构架：他问到，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① 这也就是在问：人的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的超越的要求有何相干？德尔图良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关系。但在他前前后后的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要么在理论上要么在行动中认定，雅典和耶路撒冷在一些层面上是相容的。德尔图良本人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但他绝不是唯一给出否定回答的人，那些人也常常带有类似的不一致。

我的这本书，是要将肯定和否定的答案都溯源到德尔图良的问题。然而，它并不是关于“基督与文化”的。它不是一

① Praes. Her 7.

次对于西方历史的神学解释。它利用宗教来更好地观察西方历史的特定方面、西方智慧的特定形态,这些特定的方面与形态历史悠远,从古代延续至今。

这本书在几个方面是不合潮流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后现代背景下,来描述什么宏大图景(a Big Picture)显得极不合时宜。我在中世纪哲学方面所受的训练很早就提醒我注意“普遍之物”(universals)的问题,即一般概念的问题以及它们与具体个别间的关系问题,现代哲学已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再次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宏大图景赢得了“宏大”的批判。

尽管谨慎待之,我仍相信文化是实实在在的。在一个层面上,文化肯定是一种虚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有着“发生的事实”的充分根据,绝非虚构。在我看来,可以轻易察觉出它们存在于过去和当下,所以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要唤起他们的记忆或是提起他们的注意以指出这些文化的一些明证。它们不是稀奇罕见的。不过就我所知,还没有什么人以我这样的方式来提出它们。

通过将这些文化和德尔图良的问题联系起来,我就能描画出一幅途经西方历史的若干区域的路线图。德尔图良的问题决定着在这幅地图上描画出什么样的道路,通过这个问题我自然就把宗教放在中央大道上。原则上,我是依照这些文化在基督教历史上的本来面目来呈现它们。就我的学术背景而言,我不能用别的方式写这本书,我也不想那么做。近年来的国际事件凸显了宗教作为这个世界中的一股力量是何等重要,忽略对于它的研究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是何等危险。

于是,我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谈论宗教人物和宗教运动,但我只是就它们作为“文化”的表现来谈的。对于“文化”这个词,我意指四种宏大的、自我确证的构造,它们囊括了符号、价值、气质、思想方式、情感、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我尤其是指话语方式的构造,因此也是指风格(style)这个词的最深刻意义。“一个人的风格就是他的本质”(Le style, c'est l'homme même)。

我认为四种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认为只有“这四种文化”(the four culture)。它们容量巨大,但并非无所不包。它们并没有解释凯尔特文化或是日耳曼文化。它们没有解释我们今天称之为商业文化、市场文化或证券文化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它们都没有解释。它们也没有轻而易举地就和任何一位重要的宗教人物联系起来。例如,我就没有在这四种文化中找到一个明显的位置来安置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他是我本人所属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如果你将西方文明想象为一个巨大的海洋,你就可以将这四种文化想象为涌动于其中的四股洋流。这些洋流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现象,但它们并不是海洋。

在下一节中,我将对每一种文化给出一个简略的描述,其中我已经预先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它们之间不时出现的敌对。但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它们之间倾向于融合,彼此借鉴,并且它们常常相互奥援,几至无法分辨,似乎想象不出在哪个层面上它们是无法通约的。如果16世纪标志着它们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那么随后的一个世纪就显露出它们最为显著的一次调和。这些文化彼此是敌手,但也是合作伙伴。

四 种 文 化

1. 先知文化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在本书中，我用耶路撒冷来代表犹太—基督传统的一个方面（仅仅是一个方面）：它秉持不可通约性、超越性、上帝的完全的他性（the utter otherness of God）。我称其为“先知文化”。以赛亚转称上帝的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the Holy One）如是说，他以隐晦的语言表白其意。保罗问道：“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在这一耶路撒冷的传统中，哲学家的论证不过是无意义的废话。在路德看来，理性（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令他感到厌弃的娼妇，《圣经》才是他立言的唯一凭据。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非此即彼（*Either/Or*），无可逃遁。

这种文化注定要大声疾呼。这种文化充满着孤立、抗争、脱离，因为无法妥协。它的旗下聚集着清教徒（Puritans）、冉森派（Jansenists）以及所有献身于宗教讨伐的信徒。宗教的以及世俗的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也乐于投身其中。这也是殉教者（还有狂热分子）的文化。最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站在高处谴责不义和堕落的文化。它要陈列腐败和不信的

* 语出《以赛亚书》，55:8。——译者注

** 语出《哥林多前书》，1:21。——译者注

现状的条条罪状。正义(justice)一直是它贯穿始终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还有其他的变体,像正直(righteousness)以及正当(justification)。自由也是它最钟爱的一个词。这种文化追求最大的纯洁,将别人当做生活中正常的折中妥协而加以接受的东西揭露为可憎的事情。它不能妥协。集结与抗争才是它所要的。谈判桌?绝不可能!

如果这种文化必然会谴责当时的时代,那么它也一定会许诺一个更好的时代将会到来:“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掩盖万民;耶和華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因此,这是一个怀有伟大期望的文化,那种期望超越了一切人力所能及。启示录许诺了“一个新天新地”。马丁·路德·金拥有一个有限得多但似乎仍是无法实现的期望:“我有一个梦想。”

这种文化诉诸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向少数人显露,对多数人隐蔽。上帝的意愿如此。在一个后启蒙的、更加世俗化的背景下,那个标准会采用一种无可置疑的第一原则的形式,常常诉诸权利——生命权或是选择权。它将集结一切受压迫者:“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自由,不再有枷锁。

因为那个标准远非论证,它必须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甚至是喊出来,就像好消息和坏消息的通报者一样。它的话语方式是命令式:忏悔吧!它在宣言中表现出来。它肯定在有些时候会喧闹嘈杂。卡莉·内申(Carrie Nation)**在和酗酒的罪恶作战时把她自己描述成“一只在耶稣脚下跑来跑去的斗牛

* 语出《以赛亚书》,60:2。——译者注

** 卡莉·内申,1846--1911,美国禁酒运动的重要成员。——译者注

犬，朝着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吠叫”。

先知们通过一组组尖锐的对立来宣布他们的预言，上帝/魔鬼，基督/敌基督，灵/肉，恩宠/自由意志，善/恶，爱国者/叛国者，资本主义/其他的什么制度，政治正确/政治不正确。必须做出选择，因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这种文化这么看待耶稣，耶稣说他所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纷争，儿子与父亲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再也没有什么人比明斯特的再洗礼派教徒(the Anabaptists)**更严格地遵照这一教谕了，1534年他们暴力处死了所有不虔诚上帝的人。

然而，在这一文化的旗帜下，也聚集着像多萝西·戴(Dorothy Day)、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以及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这样的温和人士。再洗礼派中的一支，“瑞士兄弟会”(the Swiss Brethren)则和明斯特的那么好斗者完全不同，他们看到的是耶稣所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于是他们就尽可能弃绝这个世界。他们的宣言就是要远离尘世，迁至一个为这一目的而构造的超凡的世界。他们是亲证实践的先知。他们的极端沉默和消极忍耐就像语言的大声疾呼一样宣告着他们的真理。类似这样的悖论也是先知文化的特征。

* 语出《路加福音》，12:53。——译者注

**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受洗才为有效。——译者注

*** 多萝西·戴(1897—1980)，美国20世纪著名人权主义者，倡导和平主义，60年代皈依天主教。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1945)，抵抗纳粹政权的德国信义宗神学家及牧师，1945年4月9日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奥斯卡·罗梅罗(1917—1980)，天主教圣萨尔瓦多总主教，支持革命运动，1980年在主持弥撒时遇刺身亡。——译者注

**** 语出《约翰福音》，18:36。——译者注

无论采用什么形式，训谕总是包含着转变、变革以及最终的承诺。对于这种由皈依所带来的彻底的有时候是猝然的价值倒转，前往大马士革之路的保罗为其提供了一个范例，迫害者变身成使徒。威廉·詹姆斯所描述的“第二次诞生”用于这种文化恰如其分。

教宗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曾提出过一个改革计划，要使中世纪的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本人则为改革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一心一意确立正义的秩序而不惜任何代价。和那些“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以赛亚书》，58:2)的先知一样，格列高利担忧，如果他像“哑巴狗，不能叫唤”(《以赛亚书》，56:10)，他就无法完成他的使命。这一焦虑促使他要去凌驾于那个时代最强势、最显赫的人物，“罗马的”(即日耳曼的)皇帝之上。^{*}他在早期教会的教会法规(既有真实的也有伪造的)中发现了裁夺事物的标准，它在人们的视野中失落已久。他援用古代的资源来为他的革命辩护。就像对于许多革命中的情况一样，格列高利以回复美好的古代岁月的名义战斗，没有意识到现在的社会相比于古代已经发生了巨变，他所提出的计划，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前所未闻的。

这场剧变以他的名字命名，史称“格列高利改革”(the Gregorian Reform)或“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它在西方的先知文化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标志

* 指格列高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主教叙任权之争。他曾革除亨利教籍，迫使亨利于1077年严冬亲至意大利卡诺莎向其请罪求恕。他让高贵的德皇在室外整整等了三天，直到使其受尽了精神上的侮辱后才出来恩赐给这位忏悔者一个赦罪的吻。史称“卡诺莎觐见”。——译者注